

文化镜城与隐形书写

——戴锦华访谈录

□ 戴锦华 邹 赞

受访人：戴锦华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兼职教授

采访人：邹 赞 博士，新疆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一、与世界接轨：

80 年代的中国电影批评理论

52

邹赞：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译介国外电影理论，如《〈搜索者〉——一个美国的困境》《精神分析与电影：想象的表述》等，同时尝试以当代中国电影的实践去挑战西方理论，这些西方理论资源涉及符号学、叙事学、精神分析等，这期间您经历了一次“语言学转型”。您多次提到过当时开办的电影理论讲习班，一批大师级西方电影理论家到中国传经布道，您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经历？

戴锦华：那是暑期讲习班。我觉得人们当时并没有什么更具体的构想，完全是出于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的渴望。我们对那段时期的特殊状态已经进行过反思和批评，也就是说，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由中国走向世界这种叙述自

身的意识形态性，当我们说我们走向世界的时候，这种叙述的前提就是我们处在世界之外，这样就否定了我们此前所置身的世界。此外，当我们再次说我们走向世界的时候，那个世界已经被转换了，它先是欧美，后来变成了美国。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那时候整个欧美也在尝试走近中国，但这种热望只属于欧美左派，几乎毫无例外的是 60 年代反文化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的参与者，这些运动都跨过围墙，进入大学。

那时我们也不知道电影学是红色 60 年代的遗腹子，我们只知道当时的电影学是西方的显学，电影学者代表了西方学术的前沿，可是我们不清楚，他们是以他们的批判性、反抗性和对于学院体制的对抗而著称的。就在这样极端茫然的热情中，我们开始邀请美国大学电影系的，准确说其实都是加州大学各

分校电影系的教授们前来讲学，这些应邀讲学的教授几乎都是新左派学者。当时的暑假电影讲习班为期两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创作，一部分是理论，每个班都有两位教授。大家非常渴望，充满期待，因为这在当时来说的确算得上是一个奢华的机会。我记得我参加的是第二期，第一期我的资历还不够，第二期讲座的教授是比尔·尼克森和薇薇安·索布切克，前者是《电影的形式与方法》的编者，后者则以对歌舞片这一好莱坞类型的后结构主义分析而著称。两位教授就他们正在做的课题和研究领域展开系列讲座，他们满怀热情而来，应该是自己掏的路费，讲座费可能也没有，即使有的话也微不足道到了寒酸的程度。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和我们这些学员在知识、思想、语言、社会体认以及对世界的认知上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在我出席的那个班上，教授在上面讲座，然后有专业的同声翻译，但是坐在第一排的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学员，有些人手里拿着不止一本词典，因为教授每说出一个理论关键词，翻译就开始跟下面这些人商量，然后所有人都飞快地翻词典。因为今天我们已经约定俗成的这一整套语言学转型之后的理论关键词，当时全部都没有对应的汉译，不光是没有对应的汉译，大家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这些词的英文意义是什么。比如，text 这么简单的单词也得从“课文”说起，后来我们把它翻译成“本文”，我记得当时还有过讨论，就是说翻译成“文本”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不用

“文本”，而用“本文”。更有趣的是 context，当时有两个解释，“关联域”和“上下文”，但这两种翻译意义都不清晰，后来有学者主张译成“泛文本”，大家广泛接受了这种译法，我在自己早期的文章中也大量使用“泛文本”这个词，大概到 90 年代初，这个词才被约定俗成为“语境”。我记得薇薇安·索布切克很可爱地看着这帮人疯狂而热烈地讨论，讲座就是以这样的形式进行的。我当时还厚着脸皮向比尔·尼克森教授借来《电影的形式与方法》，花几十块钱把它复印了，这在当时已经超出了我的月工资，我后来翻译的一些单篇文章，很多都是从这本书中挑选的。说实话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翻译，是想读懂，想要读懂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把它翻出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我开始了解到麦茨在电影理论中的位置，知道麦茨之后的电影理论发展脉络，凭着这些外来的读本和各种各样的断篇残简，我开始了电影理论的“拼图游戏”。

但是接下来的一个经验，就显得尤其重要了，暑期讲习班的两三年之后，电影学院邀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尼克·布朗教授讲学，他做了一个西方电影理论流派的系列讲座，包括所谓的古典电影理论和现代电影理论两部分，也就在这时候，我们已经开始筹建电影理论专业了，所以多多少少有了一点跟尼克·布朗对话的资格。应当说，尼克·布朗的系列讲座提供了迄今为止都值得中国电影人去学习、去把握西方电影理论的一张地图。

邹赞：您早期的电影批评明显受惠于结构主义、符号学，尤其是克里斯蒂安·麦茨的理论。此外，我们知道当代电影理论与左翼政治之间的亲缘关系仿佛已经成为“常识”，电影理论作为60年代文化政治的一份遗产，成为当代批判知识分子操持的有效思想资源。那么，这段讲习班经历是否直接影响到您后来的电影文化研究，尤其是富有左翼色彩的意识形态批评？

戴锦华：你也发现了，我最早开始在电影批评中用西方理论，当时读了麦茨，听了暑期讲习班，也开始尝试翻译美国电影学者的电影理论文章。在比尔·尼克森的两卷本编著当中，其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文章，都是文本细读的案例，确切地说，是理论化的文本细读。我在这个过程中开始真正地操练理论，之所以说是真正的操练，因为是为了用而用。我这么说是有点极端的，我说为了用而用，指的是当时真的没有能力消化和理解这个理论的脉络、切入点、思路和方法，只是掌握了若干理论关键词而已，于是试图将这些关键词相当生硬地套用到写作中去，这是一个真实的状况。

但另一方面，我发自内心强烈地想要脱离既有的批评范式、批评语言、批评方法，这种冲动和愿望是另外一个动力。第三个动力是，我在阅读麦茨的《电影符号学》的时候，狂喜地找到了一种触摸和到达艺术，也就是形式层面的那样一种路径，而且觉得它比我曾经在韦勒克、沃伦那里获得的欣喜更为深

刻。我开始花大量时间阅读和思考电影符号学理论，同时系统地旁听摄影系和录音系的专业课程、技术课程，这样一来，我获得了一种用理论语言去阐释电影文本，表述电影的光影书写的能力。我曾经梦想自己成为一个诗人，也曾投注了那么多的心力去写诗、去读诗，但是我在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意识到，所有人在这个年龄之前都是诗人，只有在那以后，才会明白谁是真正的诗人。而我就是那个“所有人”，而不是那些真诗人。我把这种遭遇挫败的写诗的强烈愿望转化成一种能量，投射到了学术性的写作当中。

加州大学这些教授带给我们一个大礼，而这个礼物当时我并没有自觉意识到，就是他们的新左派政治立场和社会批评。他们在讲座中把那种对于欧美社会的批判性揭示，把那种关于欧美60年代文化政治的信息传递给我们。由于学习电影理论，我比较早也比较系统地去了解五月风暴，了解美国的反文化运动、反战运动、民权运动。还记得1986年，中国文坛大张旗鼓纪念新时期十周年，我们出席了纪念新时期十周年的学术会议，在会上获得了极大的思想优越感。因为当时他们在热情地讨论文学主体论，高谈阔论文学主体、自主意志和特立独行的个人，而我们在热情地讨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我们借助电影理论到达了这种意识形态批评，开始去讨论臣服的主体。

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份礼物的存在，只是自己处在又一次的分裂状

态。你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你以为你是一个自觉的自由斗士，你以为你分享整个中国知识界的自由主义共识，但是在整个学术工作、思考和学术生产当中，你已经开始借助战后的西方批判理论，意识到了所谓的民主政体背后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暴力特质，而且你开始了解到整个 60 年代不只是“文革”式的荒诞，而是整个世界都“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二、从电影批评重回到文学批评

邹赞：在 80 年代寻求启蒙话语的狂热躁动中，欧美理论成为国内学者希图“突围”的重要思想资源。对女性主义而言，西蒙娜·波伏瓦的《第二性》堪称这一理论脉系的“圣经”，弗吉尼亚·伍尔夫、凯特·米勒特、西苏、肖沃尔特、斯皮瓦克等构成了欧美女性主义的“名门正派”，凡是要了解女性主义理论的学者，似乎都无法绕避过去。有趣的是，您对女性主义的关注、女性立场的浮现，都转道借自于欧美电影理论。您曾经很谦虚地说自己对于女性主义这方面的了解不是像孟悦老师那种正儿八经的，而是从旁门左道，通过电影理论接触到女性主义。这种由欧美电影理论切入的女性主义思想资源，使得您后来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具理论的灵活性与穿透力，您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关联？

戴锦华：我毫无疑问是通过电影理论获得女性主义。从 1986 年到 1988 年，我和孟悦讨论写作《浮出历史地

表》，其间我生了一场大病，在医院住了整整一年，等我回来时已经到了截稿期，我俩继续共同写作这本书。必须坦率地说，从整个的写作过程直到完稿，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是在撰写一部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著作，完全没有这个自觉，只是想把自己在电影理论当中习得的知识用在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当中，同时想通过这个写作去为自己的生命解惑，为了替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成长的生命经验解惑。到现在我也是这样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主义研究是我的业余爱好，但结果是业余爱好出了第一本书。

事实上，《浮出历史地表》是在反馈过程中被定义为女性主义的文学批评，而且被定位成中国第一本女性文学理论著作。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孟悦就作为哈佛研究学者去了美国，她也和我一样兴奋地带着自己平生第一本书去送给老朋友和新朋友，意想不到的，这本书立刻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所以说这个命名其实某种意义上对应着美国学界的指认，因为他们认出来了书中那样一种基本的性别立场、指向和性别自觉。

我想再次逆推一下。我在大学里读了两本书，一本是《第二性》，一本是《女性的奥秘》，这两本书当时是读到心里去了，它们真正解释了很多我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的绝望、痛苦和烦恼。我完全没有想到劳拉·穆尔维式的，或者是德·劳拉迪斯的理论和这两本书之间有什么样的内在连接。90 年代初，为了

回应极端恶意的攻击，我开始站出自称女性主义者。其实当时只是一个回应挑衅的姿态。也是这个时候，张京媛老师从美国回国，我们成了朋友和同事，也是通过与她共同阅读、共同翻译，我开始系统地学习女性主义的理论和著作。

邹赞：您在《涉渡之舟》中谈到想以这本书去梳理 80 年代的个人经验，把性别的东西放入了一个社会历史实践的框架当中，尝试对性别议题做一个反思性的观照，比如说，试图用“女性写作”这个概念去代替女性文学，这些论题和思考浮现出来的具体社会情境是什么？

戴锦华：还记得 1988 年的时候，我正处于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无论是学术上还是社会上的，自己的状态都好得不得了，我常常这样描述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段，虽然记忆不一定如此精准，但我确实觉得那就是 20 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之一。那时中国处在这样的状态，一方面是全面的社会主义保障，但另一方面，中国的 80 年代是一个倒置了的欧美 60 年代，所谓倒置了，是指两者的价值和追求目标相反，但是形态非常相近，整个社会高扬着社会主义的理想，批评话语的言说空间相当自由。所以当时我们觉得一切皆有可能，自信、大胆地去尝试一切。整个知识界的这种自由主义的共识，再加上对于西方的幻觉，随后导致了“六四”的发生。这次事件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去国离乡、焦灼等待，频繁的离别，各种各样的预测，我们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期盼和等待，最后迎来了南巡讲

话。陈平原为《学人》撰写的发刊词，还有汪晖写的两篇散文，都非常贴切地回顾和评价了这段时期。我记得陈平原的描述十分准确，他说当我们还处在一种为国家去殉难、去赴死、去挺身抗暴的悲情中，却突然间发现，我们被市场宣布为一文不值。我也在其他访谈中说过这段经历，记得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一起创办电影理论专业的很多青年朋友都散去了，或经商下海，或投资盈利，最差也要去拍电影、拍 MTV，总而言之是可以赚到现钱的。社会转型和市场巨变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创伤，还记得我当时最好的一个朋友和合作者，听说我还在学校里教书，就极端恶毒地讥刺说，“你还在海人不倦啊”。另外一个年轻的同事，一段一段地背着本雅明跟我辩论，说我们必须放弃学术，他背的那部分就是文人走向市场，表面上是观望，实际上是在寻找买主。有时候想想，我们哪里比张艺谋差呀，人家每天都在升值，可我们每天都在贬值。当出租车司机听说我在大学里教书，每月只赚取一百多块钱的工资，他们满脸同情。面临这样的情况，我当时做出的决定就是离开电影学院，1993 年回到了北大。现在想想，当时真的是严重失眠，半夜会坐起来痛哭，我感觉到所有真实的东西都被粉碎了，很难知道自己的存在意义是什么。但是我当时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不想改变，我不想加入那个大潮当中去。于是我决定回到北大，因为北大那些朋友虽然也不安然，但他们至少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得安然无恙。

这就是现实方面的改变。

此外，我当时的强烈感觉是中国的电影现实已经不能在原有电影理论自身得到解释，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而且我也觉得做80年代式的电影批评不够。我原本以为自己写“断桥”“斜塔”的时候虽然是在谈电影，但广泛涉及了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用同样的方法去分析此时的张艺谋现象。或者我觉得，这个根本在中国国内看不到的张艺谋，我去讨论他也不能达成我去讨论中国社会的目的。但是用什么来改变呢，我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所以当时采取的是以退为进，《涉渡之舟》的写作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发生的。我一直说女性主义是我的业余爱好，这并不是自谦之词，而是因为我觉得女性主义或对女性文学的研究一直是一个非常个人的，和我自己个人生命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这时我又重新回到这些文学批评当中。

三、戴锦华与女性主义研究

邹赞：我们发现，您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趣后来转移到更加灵活宽泛的文化研究，2006年台湾麦田出版的《性别中国》应该算是在《涉渡之舟》出版后，比较专门性地处理性别议题的著作了，这本书的序言部分深入剖析了当下性别议题的种种症候，明确提到，但凡照搬欧美女性主义理论或者单独谈女性主义而撇开其他社会结构性因素的批评路径或理论话语，都将面临失效。

您是如何意识到这一点的？是什么因素使得您由性别研究转向文化研究？

戴锦华：1994年我去了美国，到美国后被冠以两个头衔，一个是中国第一位亮牌子的女性主义者，或者中国第一本女性主义文学著作的作者，另一个头衔会更经常出现，那就是中国的第一一个文化研究学者。我当时以为这个说法是对《救赎与消费》《想象的怀旧》这批论文的命名，后来我才意识到也是对《雾中风景》的电影写作的命名。美国学界认为我的电影研究是一种文化研究，采取的正是文化研究的方法。

1995年我回到中国，那是一次新的震惊体验，真正感受到“洞中方几日常，世上已千年”。一个重要的社会变迁是国营大中型企业转轨，失业冲击波达到了高峰值，整个中国的所谓资本主义进程处于最紧张的状态之中。我当时最强烈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奔涌着、流淌着仇恨，而这种仇恨是没有名字的，盲目的仇恨很快演变成偷窃、抢劫等社会暴力。此时，这个巨大的、极端残酷的社会转型被整个罩上了一层性别修辞。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人们只谈打工妹不谈打工仔，只谈下岗女工不谈下岗工人，大众媒体反复呈现和渲染的不是失业工人的痛苦境遇，反而对女性再就业、全职太太等议题津津乐道。因此当时最先浮现在我面前的就是性别议题，但我清楚地知道，性别议题始终只是阶级议题的一个面具，这也是我首次面对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固有困境，那就是阶级和性别之间所谓的选

择和别无选择。

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推动了女性主义的普及，中国的女性主义者有如雨后春笋，性别研究在各大学校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建立。但此时你会发现，女性主义叙述所能够对应和呼唤，并形成强有力的言说的，是“新富”，或者是后来成为的“新中产”，而这样的女性主义叙述根本没有办法和下岗女工、打工妹相对应。所以对女性主义者而言，一方面作为女学者，我必须面对这些性别话语发言，但另一方面当我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发言的时候，我真切地觉得我全身都散发着一一种让我极度厌恶的中产阶级气味。可是反过来说，我当时曾经以为我可以在性别讨论中纳入阶级维度，但进而发现会陷入一个古老的两难困境，或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快乐的婚姻”。我那时候正在经历“向左转”，第一次极端明确地要思考形成之中的中国社会底层，思考整个现代化过程的付出者和被牺牲的群体。那么当你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性别的面向又被剥夺了，而一旦讨论性别面向，别人会以为你是在弱化问题或取消问题，原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早已经是一个不快乐的婚姻！

我在反思之后认识到，阶级和性别各自从属于一个宏大叙事的范围，而这种宏大叙事本身就是笼罩性的、排他的。我在经历“向左转”的过程中，不光是女性主义成了问题，马克思主义也首次成了问题，成为了需要反思的对象。在遭遇到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

双重困境下，文化研究再一次充当了一个出口。伯明翰脉络的文化研究为我提供了一个思考社会问题的理想切口，文化研究以阶级、种族、性别为三个基本的问题面向，它的跨学科的灵活性以及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为我思考和处理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有益的参照。你所说的转变大概就是这样发生的。

应当说，性别维度始终是我思考、观察或者分析任何问题的内在维度，但我不想使它成为独立的维度。我应邀出席过很多性别研究的会议，也发表了系列文章，但有一篇论文我始终认为自己没有完成，那就是《阶级与性别》。

邹赞：您最近几年很少出席纯粹的女性主义学术会议，也很少参加以女性主义命名的社会活动，您能否简要谈谈中国当下女性主义批评面临的主要困境，或者说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戴锦华：我觉得问题还是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女性主义自身的推进，另一方面是女性主义如何适应以下两个变化，一个变化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深入日常生活的全球化，女性主义该如何去面对？另一个是从世纪之交到今天，中国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也发生了巨变，女性主义该如何去回应？具体地说，我们是否依然可以沿用这些以五六十年代为源发语境的欧美女性主义思想资源。

我们必须去追问这些资源还有没有用，并且给出自己的答案。我偶尔会出席一些女性主义电影节担任评委，当我参与这些活动的时候，我试图改变一些

东西，比如说，将女性主义电影节与女同性恋者电影节画等号的情况，它其实衍生出的不止是女性主义的问题，而是我们当下如何去处理多数和少数之间的关系问题。少数的道德正义性，少数所具有的反抗动能和空间，这个本身是60年代一个非常特殊的产物。我很喜欢马科斯的那种说法，就是“化装成少数的多数”。实际上今天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少数人，他们集合起来反抗剥夺他们的多数群体。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路径。我认为中国女性主义的问题在于，当你以少数人的名义去发言的时候，你怎么面对多数人被剥夺、被践踏的状态，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恰如我们刚才谈到的，欧洲的女性主义理论源自白人女性主义理论，其初衷是尝试应答战后福利社会形成之后中产阶级群体当中出现的女性社会问题，它确实高度吻合和对应着今天中国的中产女性或知识女性的生命状态，但这至少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无趣的。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还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技术革命，比方说，生物工程、基因技术的突破，数码技术的革命，这二者又开始在欧洲整体地改变着社会的结构。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一边是父权或者男权制度无所不在，我迄今为止仍然认同一个说法，“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父权制”。但是另外一边，它已经不再能够那么形而下地对应着身体的女性或者身体的男性，并且欧美一些国家对于同性恋婚姻的立法和通过，也在改变着传统家庭的权力结构。当下

女性主义的使命，应当是不断思考该如何面对社会情境的如此巨变。

总的说来，我对于女性主义的讨论滞留在女性意识、女性生命和一再、再而三地去发现男权，感到极端的厌倦了。这大概是我不大参与这样一般意义上女性主义会议的原因。

四、第三世界考察之旅

邹赞：您曾经在回顾自己的学术心路时提到，2000年左右遭遇了一次学术上的自我困扰，仿佛陷入了一个鬼打墙式思想瓶颈状态，然后您开始寻找另类的社会实践与思想资源，先后去印度、拉美、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访问。这段经历之后，我发现您把全球结构、后冷战的文化政治、另类现代性实践等更具国际性视野的思考向度纳入了对当代文化现象的分析。您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段去第三世界寻访的经历？

戴锦华：我们这一代人和你们这一代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被60年代赋予了一种深刻的内质，我称之为“知识分子的原罪”，我们是携带着原罪的一代人。这个原罪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你深知你所做的事情和社会实践没有直接的关联，既不是实践性的也不是生产性的，但另一方面，你始终有一种强大的焦虑，迫切地想知道自己和这个变革中的社会以及身处这个变革中的社会的人们有着什么样的关联。也许你并不处于社会底层，你也不是人民大众，在任何时代来说你都处于社会的中上层或中

下层，分享着各种各样的权力利益，但是对你来说，有一种强大的对于弱势群体、对于底层人的那种生命认同。这种认同不是出于崇高的使命感，而是一种你完全不能自己，但又希望为这些特定的群体做点什么的心理愿望。那种社会现实的剧烈和紧张，连同你目睹这种社会现实的自我焦虑，它被一个东西触动，这个东西就是1999年的小剧场话剧——《切·格瓦拉》。这部戏无疑非常粗糙、简单化、粗暴，可是它对我来说成了那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开始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你是否应该有所行动？你是否应该有直接的介入？我一直不认为行动和直接的介入是可以兼职的，因为学术思想的工作需要全身心投入，参与者、组织者、介入者的工作也需要百分之百的投入。所以突然之间，我把自己推到了这样的一个危机状态。我当时思考的是辞职，投身社会运动。最后之所以没有做出这个选择，不是因为利益和现实的考量，而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要什么样的未来，我也不知道我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去的具体目标，我更不知道我能带着大家往哪儿走。

这次经历的危机状态带来了两个结果。一个是回到老路上读书，我开始系统地阅读，应该说从学术起步之后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这么大量地系统阅读过。一方面广泛涉猎世界上的同行、同代或者前辈们对于后冷战时期国际问题的思考。我本以为他们会给我提供启发，但是没有找到。我发现我和他们陷

在了同一个瓶颈的位置上，我走不通的地方他们也走不通。他们可能在语词的意义给出了某些解答，但并没有提供问题的真正答案或者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我开始大量阅读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政治史的、经济史的著作，比如，系统地读了沃勒斯坦、萨米尔·阿明、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等，也跟着朋友一起读了安德烈·弗兰克和卡尔·波兰尼。通过阅读此类书籍，开始不是望文生义、道听途说，而是比较系统地了解世界体系，了解到冷战时代这批前辈思想者如何去指认全球资本主义。我后来把这段阅读体验称作政治经济学转向，收益确实很大，但是仍然无法回答我自己渴望回答的问题，因为很简单的是，此时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整个战后的西方思想，包括文化研究在内，其实都直接或间接地依托在冷战结构之上。而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构的一极消失了，所以这些思考本身的局限就很清晰地显现出来了。

此外，我又一次全面追溯了全球60年代，但是这一次的重点不是学潮，不是“密室里的谋反者”，而是60年代的行动者。之后我又产生了一个梦想，想象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可能存在着很多的思想者和行动者，他们正在创造不同于苏联，不同于美国，当然也不同于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思考或追求。正是出于这种目的，我参加了刘健芝、汪铁军他们的小组，我们开启了第三世界考察之旅。这时候反全球化的呼声高

涨，一些非政府组织走在了反全球化运动的前列，所以我们最早参与的就是世界社会论坛对抗世界经济论坛。后来我们去了拉美、东南亚、非洲，去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接触了许多不同的社会运动、基层组织和民间的思考者。但我最初的构想再次落空，这时候我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没有什么地方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之外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铁蹄践踏了整个地球。当我在切·格瓦拉的书架上看到阿尔都塞的文集，以及这本文集被读得边角都卷起来并带有很多眉批之后，我意识到一种尝试在第三世界走出一条终结全球资本主义之路的实践已经在 60 年代发生过了。

这段寻访的经历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个人生命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你真的完成了走异乡、行异路，发现了别样的人们，你看到了别样的人生，你目睹了不同地方的人们为了求得生存而经历的挣扎与反抗。我没有找到任何答案，而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真正放弃了在学术上做政治经济学转型的努力，相反是回到了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之中。但我觉得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政治经济学的面向已经内在于我的思考当中了，我也比较踏实地知道自己获得了真正的国际视野，它不再是我成长年代的国际视野——亚非拉视野，也不是我开始学术年代的国际视野——欧美视野。我开始不只是在理论上，而且是在个人的身体经验上认识到欧美世界是如何与亚非

拉紧密连接和互动的，欧美的富裕，包括他们的民主是怎么建筑在第三世界的赤地千里之上的，同时也认识到第三世界所面临的普遍困境。

由此，我清楚地认识到一个知识分子的工作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一个层面是创造性的思想工作，我们今天的时代呼唤着全世界有现实责任感的人们参与到一个创造性的思想当中，因为现实世界没有既定的思想资源和解决方案，但我们又必须要有。第二个层面是，我们必须有广泛的文化战场去对抗一极化的、单一的价值观念。至于第三个层面的工作，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不同形态的志愿者，参与到所有的现实的另类实践当中去。我自己这十多年来大概尝试在这三个层面上工作，虽然成就都不高，但是都在推进。

五、“理论应该被进一步丰富、创造”

邹赞：英国文化研究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曾出现过“理论与经验之争”，以佩里·安德森为代表的第二代英国新左派积极从欧陆寻找思想资源，随着福柯、葛兰西、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话语的涌入，英国文化研究日益偏离民族志的经验研究，理论色彩过浓，这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反思和质疑。而在一本名为《新文化研究：理论的风险》（*New cultural studies: adventures in theory*）的论文集中，编者明确指出文化研究的理论不是过多而是不够，他们试图

将文化研究再度理论化。您如何看待“理论”对于文化研究的当下意义?“理论”是否依然有打开思想空间的可能?

戴锦华:我们今天指称的“理论”(theory),其实是二战之后欧洲的一个发明,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也不是原来意义上那种以感性和审美判断为主导的批评。这种理论对我来说基本上重合于或者约等于批判理论。但是,我们今天确实应该坚持理论,因为理论自身作为战后的发明和创造,它仍然携带着批判的动能、批判的路径和批判的方式,只不过我们需要提高警惕,将自己始终置身在那个张力状态当中,而且同时保持理论的弹性。这些年来,我自己除了造访亚非拉之外,也去了很多中国的农村特困地区,我非常惊讶地发现不用担心交流和沟通障碍,我对农村妇女讲话没有困难,我当然会调整我的语言,但是我并没有刻意去换一套方言土语,我仍然用我的思路,但是我想传达的东西却无保留地传达到她们那里。印象最深刻的是,我讲完之后她们就整句整句地引用我的话,她们的兴奋是溢于言表、发自内心的。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在于你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语言的问题,而在于你有没有真正地把她们作为你的言说对象,也就是你是否置身于那样的社会空间,是否依然还在这些人群当中。我们经常提起威廉斯、汤普森、霍尔,他们携带的宝贵财富是他们自己在工人阶级社群当中的成长经验,是他们作为新移民,作为新的个人的这种生命

经验。文化研究的意义就在于生产那种活着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是可以被人们分享和使用的。我们今天面对的农村基层妇女并非大字不识的家庭主妇,她们普遍接受过初、高中教育,她们也在读诗歌,读各类文艺作品,她们甚至担任着各种各样基层妇女杂志的通讯员,她们是有机知识分子。和她们交谈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新鲜的经验,这种交流比我跟某些大学同行之间的谈话要远没有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理论是必须的,理论应该被进一步丰富、创造,文化研究面临的问题不在于理论,而在于我们是否自觉坚持文化研究的初衷,是否能够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那个张力,这种描述显然具有修辞性,但对我来说是真实的。文化研究说到底就是文化游击战,游击战就是真正的要求高体能、高智商,因为你是处于一个如此分散的、力量对比上根本不成比例的状态之下推进工作,你必须承受那种边缘的、暧昧的、不被承认和不被接受的状态,同时不断穿行在不同学科领域,通过借重各种学科范式并搭建起它们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联,进而获得你的生命力。如果我们能保持这样的话,我觉得文化研究仍然是一个充满生机的领域。但如果我们最后把它变成了诸多学科其中的一个学科的话,我觉得文化研究即便走向死亡也不足为惜,因为不同的学科足以完成文化研究在学术本身所能完成的工作。

(责任编辑 林诗雯)